



郑天挺先生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。他长于中国古代史研究,尤精通明清史,成就卓著,影响深远,是继北大教授孟森之后中国现代明清研究的重要开拓者;他在南开大学工作三十年,为南开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。

郑天挺先生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,他在北京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南开大学等高校校务与教学管理方面贡献良多。他曾任教于北大预科,后赴广东、浙江等地短暂任职,1930年冬再回北大,此后郑先生长期在北大任教,担任校秘书长一职长达十八年,其间又任西南联大总务长、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、北大史学系主任;2017年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的出版,不仅给西南联大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,也让世人看到郑先生为西南联大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。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,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北大学生的名义赠给他题有“北大舵手”四字的锦旗。1999年9月,在“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”上,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说,郑天挺先生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大,在北大几次重要关头,如“七七事变”后的北大、抗战时的南迁、战后的复员、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,郑先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是北大的功臣,他对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。1952年后,郑先生主持南开史学三十年,借用何芳川教授的话,郑先生将最成熟的学术奉献给了南开。

郑天挺先生的一生,尽管行政事务缠身,但他始终坚持史学研究,在中国古代史、历史地理学、边疆史地学、史料学、文献学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,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。尤其在明清史领域,他与孟森先生同为重要开拓者。郑先生慎重为文,加上行政工作极繁,公开发表的著述不算多,但他发表的论著都是精品,傅斯年先生即称赞郑先生“不为文则已,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”。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,郑先生侧重明清史教学与研究,写出了大量颇有影响的论文,如《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》《多尔衮与九王爷》《杭世骏(三国志补注)与赵一清(三国志注补)》等,又特作《清史满语解》近二十条,解释了清初许多特殊用语的含义和制度的变化,如“土黑勒威勒”“牛录

津沽学人

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天津日报

合办

我来江阴,是要寻找一个人——被誉为“千古奇人”的徐霞客的踪迹。从名满天下的华西村来到江阴,路人“旷世游圣”的故里,却没有时间一瞻徐霞客故居,至为可惜。住在了江阴北郊,就近登了君山。这是一座锦屏似的小山,面积40余万平方米,也不高,海拔仅70余米,却有响亮的名声,素有“江阴主山”之称。何以如此?其实也不必费思量,这是君子之风的表现。谦谦君子低调而不张扬,温润如玉,反而更受尊崇。

解读山水(六)

谦谦君山

李昱坤

江阴旧志里描绘君山有玉的潜质:此山隆起平畴,横枕大江;邑中诸峰,四面环拱;北眺维扬,南抱姑苏,东望海虞,西顾京口,为一方之大观,列郡之雄胜。

沧桑桑田,如今的君山已不再横枕大江。由于泥沙的冲积,原来从北麓流过的浩浩长江,已退至一公里之外的远处。

我来登君山,更主要的是想在这里追溯文化之源。江阴历史悠久,见诸文字记载已有2500多年,心中默念,便涌起波澜。君山原名瞰江山。相传战国末年,游学博闻、能言善辩的楚相黄歇被李园所杀之后,葬于此山西麓。黄歇号称春申君,是战国四君子之一,事迹多存人心。吴地百姓为纪念春申君,故将此山改名为君山。

春申君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。相传他明智忠信,厚爱文人,以礼贤下士、招揽宾客、辅佐治国而闻于时。楚顷襄王时,秦昭王派大将白起统兵打败韩、魏,又联合两国共同伐楚,危急之际,顷襄王派能言善辩的春申君使秦,说服秦昭王退兵。顷襄王病重,春申君设计使留在秦国为人质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国即位,即楚考烈王。考烈王任其为相。秦军围攻邯郸,春申君带兵救援,解了赵危。后又为楚北伐灭鲁。当时楚考烈王无子,春申君以此为忧。后娶门客赵人李园之妹。李园之妹有孕后,献于考烈



孙卫国

额真”“札尔固齐”“巴克什”“巴牙喇”“巴图鲁”“包衣大”“包衣昂邦”等,解决了清史资料中常遇到的一些关键性疑难问题。抗战期间,为批驳日本以侵略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“满洲独立论”等谬说,郑先生写出了《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》《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》等重要论文,用大量史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、蒙、汉三族的血统,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。这些论文均收于《清史探微》中。郑先生生前刊出的主要学术著作有《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》《清史探微》《清史简述》《探微集》等。近些年来,新编的《及时学人谈丛》《郑天挺文集》等陆续出版,进一步呈现郑先生的学术成就。

明清内阁档案的发现与整理,是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界一件大事,郑先生既是积极的参与者,更是重要的组织者。早在1921年入北大国文学门做研究生时,他就加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,参加清代档案的整理,由此奠定他清史研究的基础。抗战胜利后,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明清史整理室,郑先生亲自主持工作,作出了不少成绩;曾与故宫博物院合编《清内閣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》,帮助东北图书馆印行《明清内閣大库史料》第一辑;1950年举办“明末农民起义史料”展览;1954年主编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《明末农民起义史料》《宋景诗起义史料》。上世纪50年代,郑先生组织南开历史系编纂《清史史料选编》《明史史料选编》;60年代初,他与翦伯赞先生共同主编了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》,并主编《中国史学名著选》;从60年代初期开始,郑先生负责张廷玉《明

王,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,即后来的楚幽王,李园之妹被立为王后。李园逐渐掌握楚国大权,蓄养死士,欲杀春申君。考烈王病死后,一日,李园令人埋伏于寿春棘门之内,杀死春申君,后又株连其全家,仅一子在吴地得免。春申君如日中天时,因小人作祟而殒命。人们至今纪念他,说明爱国者最经得起时间的淘洗。

君山西麓原有一座东岳庙,据此地传说,元代末年,朱元璋领兵东征张士诚时,曾驻军于此。黄歇墓就在庙阶之下。那天,遍寻之下,不见东岳庙,遇一老者,恭敬询问,老者手指处,东岳庙旧址仍在,头门、三元殿等建筑兀自挺立,在细雨中泛着古意。原来这东岳庙经一番整修后,已改名为“武庙”,但东岳庙三字匾额仍然高悬。一般情况下,江南的武庙是要祭祀岳飞。的。幸再经指点,近处有一墓肃然,立“楚春申君黄歇墓”石碑。据我对历史的了解,这当是一座衣冠冢。相传黄歇遇害后,所封邑之诸民无不思恩怀惠,至楚求其柩而葬之不可得,后乃奉其所遗衣冠以王礼葬焉。虽是如此,我仍就近采撷一条路边的勿忘我,花朵虽小但鲜艳之极,恭敬而献。

因历史悠久,这里儒、释、道并存,留下了众多遗址古迹,文人雅士多有诗篇吟咏,确然是江南一文化名山。这里放眼皆是古迹,且皆有传说。我却不只陶醉于传说中,引领者告诉我,这里原有一楼临江而建,直白曰“望江楼”,楼有一副气概非凡的楹联:“此水自当兵十万,昔人曾有客三千。”一举将长江天堑和黄歇的典故都包含于内。旧时,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东岳庙香节,香客上山进香,游人登楼瞰江,一时为盛。我自是无意细考,只埋头循着庙旁的山路拾级而上。半山见一亭,形制不似明清时亭子,广檐斗翘,乃典型的始建于宋代的建筑。相询之下,果然为宋之“松风亭”。亭内小坐片刻,凉风习习,拂面惬意,想起资料上看到的诗句“君黄龙风长,稷定龟花香”,这句诗是用江阴十大名山之名拼成的,君山居首,得登君山,顿觉多少弥补一些江阴之行的遗憾。

回返时,见武庙门前两棵古银杏树依然枝繁叶茂。我斜倚一棵,留影而去。既然什么都带不走,干脆就带走点感动和记忆吧!

沽上丛话



群壑风来满山听(中国画) 王大成

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所作《花果小品》一书,2024年6月由中华书局再次出版,并由责任编辑胡正娟女士收集、增补郑氏散见于其他出版物的文章41篇,可以说是郑逸梅谈论花果的文章收罗最丰富的一个本子。

该书最早在1935年由中孚书局出版,后来又由华夏出版社在1988年,中华书局在2016年先后再版。最新版中增收了4篇郑逸梅谈此书写作、出版缘起的文章,让我们知道了该书的成书与园艺家黄岳洲,作家、翻译家和园艺家周瘦鹃都有关系。

比较郑逸梅与黄岳洲、周瘦鹃这三位名家,可以说是各有千秋。黄是民国时的园艺专家,先是在上海真如西北的三千里村建有一园,人称“黄家花园”(以下简称“黄园”)。后因日寇在1937年进攻上海,三千里村的黄园被毁,于是又在高思路(今高安路)另建新园(今上海第五十四中学即其旧址)。黄岳洲与其长子黄德邻合著有《花经》一书,是一部园艺学专著,代表了民国时期园艺学的最高水平,文笔亦颇可观。童年时我见祖父书架上有一部,经常取观,对我有很大影响。

郑逸梅因为喜欢花果,和黄岳洲认识后就常有来往。他在《漫谈〈花果小品〉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谈花说果,无非受黄岳洲的影响。”又写黄园在搬到高思路后,因距离较近,他几乎每星期日都去。黄岳洲、黄德邻父子写成《花经》后,还曾请郑逸梅和周瘦鹃帮忙校订,所以郑氏和《花经》的出版也有些关系。

郑逸梅在书中多次写到去黄园观花的情景。比如在《菊花》一篇中写黄岳洲爱菊,在黄园中植有菊花一千多种,秋日菊花盛开时,黄邀友人前往观赏,

当1952年郑先生从北大奉调南开时,历史系则恢复数年,无论资料还是师资方面都相当匮乏,在全国可谓名不见经传。郑先生调来后,决心“要使南开历史系步入强劲之林,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并驾齐驱”。当时,他与从清华调来的雷海宗先生共同努力,加强师资队伍建设。1953年由杨翼骧先生从北大调入南开,加强中国古代史的队伍建设,并奠定了南开史学史的研究基础。组织南开历史系教师撰写教材,广泛开展学术活动。上世纪50年代后期,杨翼骧《秦汉史纲要》、杨志玖《隋唐五代史纲要》、王玉哲《先秦史纲要》等几部断代史纲要先后出版,初步彰显了南开史学的新风与实力,引起全国史学界瞩目。1956年,郑先生在南开创立明清史研究室,培养大批明清史专家,并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明清史研究阵地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先生曾说:“(郑)先生以他特有的恢恢气量和忠厚长者之风,团结了全体教师……先生于中,发挥了伯乐与老骥的双重作用,为后人念念不忘。”他将郑先生对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贡献视作“一篇无文的文章”。

在郑先生三十年的经营下,南开历史系将北大史学科那种踏实严谨、维新开拓的治学风范加以继承和弘扬,如今不仅成为南开大学文理学科“四大支柱”之一,在全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阵地——不仅因为郑先生培养的一大批弟子,都成为全国史学界的重要专家,且由郑先生所奠定的务实、求新的学风,使得南开史学多年来引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潮流。近年来郑先生与雷先生被公认为南开史学的两面旗帜,且被誉为“南开历史学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”。

(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学人小传

郑天挺(1899—1981),原名庆姓,字毅生,祖籍福建长乐,生于北京。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,曾参加五四运动。1921年春参与筹建厦门大学。1921年秋入北京大学国文学门做研究生,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。1930年冬回北京大学任教,1933年任中文系副教授、校秘书长。1937年冬在长沙临时大学改任历史系教授,随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、总务长,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。1946年北大复员后,任史学系教授、系主任、校秘书长等职。1952年秋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系主任。1963年起任南开大学副校长。1980年当选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。兼任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主编、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组组长等职。全国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天津市第一、二、八、九届人大代表。天津市社科联第一、二届副主任委员。生前刊出的代表性著作有《清史探微》《探微集》《清史简述》。近年来,《及时学人谈丛》《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》《郑天挺元史讲义》《郑天挺明史讲义》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《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》《郑天挺清史讲义》《郑天挺文集》等陆续刊出,《郑天挺北大日记》《郑天挺法制史讲义》亦在刊印之中。

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抗战文艺回眸

1945年8月13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两天,一位作家写下一组四首题为《苦战八年结束语》的诗。他用英勇的气魄,给抗日战争下了一个结束语。诗是这样写的:“一、心赛铁石坚,苦战整八年,鲜血流多次,终有此一天。二、童时倭仇深,青年即参军,跟随英明党,战斗到如今。三、岁月匆匆过,脸上线条多,问我因何故,战争将它磨。四、东讨又西杀,战场是我家,欲洗家国辱,驱寇到天涯。”

好个“驱寇到天涯”!这一句诗表达了作家抗日到底的决心。全诗简洁明了,明白如话,从个人经历过渡到家国情怀,时年22岁的作家,所作诗中却已有岁月沧桑之感。

想必在同一天,作家定是心潮起伏,回忆曩昔,又写了一首诗《回忆“五一扫荡”之一次战斗》:“麦苗充饥尿解渴,马吃篱笆怕挨说。一天战斗整四次,终于穿过滹沱河。”看来,1942年日寇的“五一扫荡”,给作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这也是后来他的代表作——人们耳熟能详的《敌后武工队》所展现的时间。作家以欣慰的情怀,记录了一天的战斗和一次渡过滹沱河的经历,用诗歌表达了对抗日战争过往的感慨。

8月14日,作家的感情进一步升华,又写下一首题为《自傲》的诗:“高歌在长白山上,狂欢于松花江畔。荷枪凯旋朝家走,志气高昂称好汉。”诗不算工整,但豪情满怀,抗战胜利的消息激荡着他的身心。这位作家就是冯志,天津静海人,他后来在1956年完成的《敌后武工队》中,描写了1942年冀中军区九分区一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、打击敌人的故事。这部作品人物形象丰满生动,故事引人入胜,影响力极大,甫问世即轰动全国,书中的魏强、贾正、汪霞及反面人物刘魁胜、苟润田等,都成为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。

1958年11月,《敌后武工队》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。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,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十二部优秀长篇小说,这其中就有冯志的《敌后武工队》和张孟良的《儿女风尘记》。更为巧合的是,这两位作者都是天津静海人,张孟良还是《敌后武工队》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。

上世纪50年代,多方寻求“解放军文艺丛书”稿源的张孟良,来到百花文艺出版社,见到时任社长林呐,希望他给予大力支持。林呐爽快地将冯志的抗日战争题材作品《保定外围神八路》奉献出来,这就是后来的《敌后武工队》。

同为静海人,张孟良是义渡口村人,冯志是大滩铺村人,乡梓情谊加文字之缘,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。

张孟良为与作者商榷《敌后武工队》这部小说的情节,曾自北京专程到天津清和大街河北省电台宿舍,找时任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冯志。冯志夫妇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张孟良,张、冯二人在饭桌上商定了情节的修订。

《敌后武工队》中魏强的原型就是冯志自己,和魏强一样,冯志本人就是武工队小队出身,书中写的故事大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经历抗日战争那段如火如荼的生活,冯志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。所以他在《敌后武工队》的序言里写道:“我所以要写《敌后武工队》这部小说,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,日日夜夜地冲激着我的心;我的心被冲激得时时翻滚,刻刻沸腾。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,在战友们的面前似乎欠点什么,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,因此,心里时常歉疚,不能平静……《敌后武工队》如果说是我写的,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。”

这是恰切的自评。冯志不仅是一名武工队队长,也是一名文工队队长。1944年,他被调到前线剧社工作,那时候冀中军区文艺团社数量多,涌现出众多人才,那些剧作家、诗人、歌唱家、导演、作曲家、演奏家等,为抗战文艺事业奔走鼓呼,渐渐地影响了更多的人。冯志在剧社工作期间,给《前线报》和《抗敌报》当通讯员,在写通讯文章之外,也写起短篇小说。一个作家的炼成绝非偶然,需要生活、阅历的训练,也需要文字的训练,那时候,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这部书的腹稿。1947年,冯志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深造,这所由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诸多学校组成的联大,与解放军艺术学院一脉相承,冯志是战士出身并在军队大学深造,这特殊的熏陶能使人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锻炼。

我藏有两版《敌后武工队》小说,都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,其中较早一部的封面图案是两个武工队队员身着便衣,头戴蓝色和白色头巾,荷枪而立保持机警的神态。装帧设计简单精美,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这部小说语言活泼生动,情节紧凑,故事性强,情绪乐观,表现了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,尤其注重细节和画面把控,不忘借景抒情,是一部难得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。

第五三八期

驱寇到天涯

杨仲达

满庭芳

第五三八期

家的成就,要高于他作为园艺家的成就。

相较于黄岳洲和周瘦鹃,郑逸梅在园艺实践方面是最弱的,他自言“一天到晚埋首故纸堆中,没有很多时间来栽培灌溉”,但是他博览强记,善于抄撮旧书,再加上自己的耳闻目见,连缀成文。

郑逸梅读书极多,但喜欢的不是五经与正史,而是笔记小说,里面的很多小故事他都能信手拈来。而且交游又极广,所以书中有许多同时代文人名士的逸事。虽有“补白大王”之名,给人的印象是他写的多是“豆腐干文章”,但其实《花果小品》里有些文章篇幅相当长。他名字中有“梅”字,而且又爱梅,所以《花果小品》以《梅花》为第一篇。

此书申虽记有不少花木的栽培繁殖之法,但多引自他书,未经郑逸梅本人亲身实践,更有一些“民间偏方”之类的所谓窍门,今天来看,仅具娱乐价值。比如写瑞香的扦插法:“芒种时剪取嫩条,破开,置大麦一粒,用乱发缠缚,插入土中。”又如写对兰花刚出土的花苞的保护:“宜用虫茧,剪开一端,去其蛹,以套于兰蕊。”这里的“虫茧”指的是袋蛾(又称囊蛾)的幼虫吐丝黏合枯枝枯叶所结成的袋形的巢,以前在上海很常见,可以随手从树木上摘取,现在很少见了。其实一般兰花的花苞并不需要如此保护,只有色花的花苞,为使开花时颜色鲜艳,可以套以纸筒遮光,这还有助于花秆拔长。

书中又收集了一些赏花之法,虽多出自他人,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材料。如记书画家贺天健曾云:“梅宜静观之,更宜于山深林密中观之。”写桃花:“桃宜与竹伍”;“桃决不能与柳并栽,二者相映,未免失之于俗”。写梨花:“梨宜月下窥之”;“又宜于雨中看”。